

# 法国《古文言读本》分析

陈金秋

**摘要：**法国汉学家汪德迈、金丝燕主编的古汉语教材《古文言读本》2016年在巴黎出版。教材精选古文言文文本二十二篇，汉字以会意字、形声字为主；词汇中单音节名词占多数；文本多选自经部文言文，旨在从解析汉字字源与字义的发展历程入手，将汉字起源与古文发展、中国思想的思辨性联系起来。教材对汉字、词汇、文本的设计与选择体现出汪德迈的古汉语文字观，即中国文字总是携带着中国文化特征，文字是深化认知、保存思辨的载体，没有文字，思辨思维只停留在话语层面，难以长久保存，因此，汉字、汉语、文本、文化之间存在思辨的关系。汉字内部结构遵循着理性化的原则来组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科学性，是不需要被转化为表音文字的。汪德迈认为，中国文言科学性和关联性的两大特点反映出中国思想具有关联理性的特征，这种思维逻辑受到占卜学的极大影响。教材中对汉字字源的探析也深刻地体现了这一论点。

**关键词：**汪德迈 《古文言读本》 汉字 中国文言 思辨理性

## 一、研究背景

自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教席设立以来，法国汉学家为了教授古汉语，对中国语言文字进行研习并创制了多部古汉语相关教材或汉字词典，如19世纪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的《汉文简要》（*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1811年）、《汉语词典计划》（*Plan d'un dictionnaire chinois, avec des notices de plusieurs dictionnaires*

chinois manuels, et des réflexions sur les travaux exécutés jusqu'à ce jour par les Européens, pour faciliter l'étude de la langue chinoise, 1814年)、《中国语言文学与鞑靼语、满语课程大纲》(Programme du Cours de langue et de littérature chinoises et de tartare-mandchou; précédé du Discours prononcé à la première séance de ce cours, dans l'une des salles du Collège royal de France, 1815年)、《汉文启蒙》(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822年); 儒莲 (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 的《汉语词汇学、句法结构和分析法的实践练习》(Exercices pratiques d'analyse, de syntaxe et de lexicographie chinoise, 1842年)、《日常口头会话》(Ji-Chang-K'eou-T'eou-Hoa Dialogues Chinois, 1863年)、拉丁语版本《千字文》(Thsien-Tseu-Wen ou le livre des milles mots, 1864年)、《新编汉语句法结构》(又名《汉文指南》,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 1869年)、拉丁语版本《三字经》(San-Tsze-King, Trium Litterarum Liber, Le Livre de phrases de trois mots, 1873年); 巴赞 (Antoine Bazin, 1799—1863) 的《官话语法》(Grammaire mandarin,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1856年); 童保禄 (Paul Perny, 1818—1907) 的《西语译汉入门》(Dictionnaire Français-Latin-Chino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1869年)、《中国俗语》(Proverbes Chinois, Recueillis et mis en Ordre, 1869年)、《拉汉对话集》(Dialogues Chinois-Latin Traduits mot a mot avec la prononciation accentuée, 1872年)、《汉语口语和书面语语法》(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orale et écrite, 1873年); 哥士耆 (Alexandre Kleczkowski, 1871—1886) 的《汉语口笔语渐进大全》(又译为《中国语文教科书》, Cours graduel et complet de chinois parlé et écrit, 1876年); 顾赛芬 (Seraphin Couvreur, 1839—1919) 的《法汉常谈》(Dictionnaire Française-Chinois Contenant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Usitée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1884年)、《汉语古文词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s, 1890年)、

《汉法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1890年)、《汉文拉丁文字典》(*Dictionarium linguae Sinicae latinum, cumbreviinterpretatione gallica, ex radicum ordinedispositum*, 1892年)、《法文注释中国古文大辞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 suivant L'ordre Alaphatibeque de la Prononciation*, 1892年)、《官话常谈指南》(又译为《法英华会话指南》, *Langue Mandarine Guide de la conversation Française-Anglais-Chinois contenant un vocabulaire et des dialogues familiers*, 1896年); 于雅尔(Camille Imbault-Huart, 1857—1897)的《法国人实用汉语口语手册》(*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usage des français*, 1885年); 20世纪汉学家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1933)的《汉语入门》(*Rudiments de parler et de style chinois*, 1898年); 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 1858—1930)的《汉语(北京官话)入门》(*Première leçons de chinois, langue mandarin de Pékin*, 1909年); 古恒(Maurice Courant, 1865—1935)的《中国北方官话语法》(*Grammaire du Kwanhua sptentional*, 1914年); 戴遂良(Léon Wieger, 1856—1933)的《汉语口语教科书》(*Chinois Parlé Manuel*, 1912年)、《汉字》(*Caractères chinois: étymologie, graphies et lexiques, quatrième édition*, 1924年); 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的《古代中国》(*La Chine antique*, 1955年)、《唐代长安方言考》(*La dialecte de Tch'ang-ngun sous les T'ang*, 2005年再版);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的《基础汉语教材》(*Pour l'enseignement élémentaire du chinois*, 1953年); 等等。

教材或字词典多以解释古汉语中的汉字、语法、词汇为主,对古言文本的介绍并不多见,汪德迈指出:“关于法国文言文的教材,最后一个版本是传教士Henri Lamasse(1869—1952)于1920年在中国出版的,如今已无存。虽然法国汉学家关于汉语文言文的著作很多,但

大多是从研究的角度，不能满足学生学习文言文的需求”<sup>①</sup>。基于此，汪德迈和金丝燕合作在法国出版古汉语教材《古文言读本》，其出版，正如编者所言，“为了满足法语国家学生学习汉语文言文的需求”<sup>②</sup>。

本文试图对《古文言读本》的教材内容进行简介，探究其汉字字源比例、词汇语法类别分类、文本年代分布的特点，分析汪德迈、金丝燕对教材汉字、词汇、文本的选择与排列有何依据，探讨该教材编写理念与汪德迈的古汉字、古文言学术观点的联系，以期对法国当代古汉语教材做进一步思考。

## 二、《古文言读本》内容简介

《古文言读本》教材，法文名：*Manuel de chinois classique*（ISBN：978-2-84279-749-2），由法国著名学者、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1928—2021）和金丝燕主编，2016年由巴黎友丰书店出版。全教材分为前言、古文本、词汇表三部分组成。教材精选的二十二篇中国经典古文言文文本，题材丰富，体裁多样，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教材包括：

### 1. 前言部分（Partie Introductive）

汪德迈在前言中谈到了出版这部古文言教材的原因和重要性。他认为古典文字仍然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学习汉语的学生应掌握阅读古文言文的能力。汪德迈指出教材最大的特点是从六书造字法的角度对汉字字源进行讲解，以满足学习者对汉字的兴趣，并专为对汉语感兴趣的学习者设计，面向欧洲和亚洲学习者，有中法文两个版本。

金丝燕在前言中介绍了与文言相关的中国古文字学、文言和白话的概念与区别、专业汉学在法国的确立、中国不同朝代言文的发展以

① VANDERMEERSCH, Léon, JIN Siyan, *Manuel de chinois classique* 古文言读本 (Paris: Editions You Feng, 2016), p.1.

② Ibid.

及古汉语发展的阶段、中国传统典籍分类法、中国古汉语教材编辑模式等概念。她指出,《古文言读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字源分析为主,按照传统经史子集四分法、王力文言讲解模式(通论、文选、常用词)对二十二篇文本进行编排教授。

## 2. 文本部分 (Leçons)

教材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 (Quatre Parties), 共含 22 篇中国经典古文言文文本。其中经部文本 17 篇, 多选自《周易》《尚书》《中庸》《礼记》《诗经》《仪礼》《春秋左传》等典籍; 史部 1 篇, 选自《史记》; 子部 1 篇, 选自《道德经》; 集部 3 篇, 选自《文心雕龙》《古诗十九首》和《长阿含·大本经》。

二十二课课文都由古文本原文、法文翻译、生字解析、通论四个部分构成。

文本原文: 包括文本标题、著作出处(拼音、法文释义)、文本原文;

法文翻译: 与汉语对应翻译;

生字解析: 包括汉字、拼音、法文释义、字源、汉字变体、汉字部件解释;

通论部分: 针对文本的补充说明与介绍。

生字解析部分遵循中国传统的文字学研究, 注重从字源着手, 通过六书造字法进行分析, 并使用大量的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符号, 尽可能形象生动地展现每一个古汉字的原貌, 让学习者更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魅力。

## 3. 词汇表 (Partie des Lexiques)

《古文言读本》最后编排了两个词汇表, 一个是按课文序排版, 生字按照“字—音—译义”排列; 另一个是按字母序排版, 生字按照“音—字—译义”排列。

### 三、教材内容分析

#### 1. 汉字统计分析

全教材共计426个生字，每一生字都配备字源讲解和法文注释，其中字源讲解以六书造字法为主。根据编者的字源解释，我们将全教材的生字按六书造字法分类：会意字的数量是最多的，为189个，占总字数的44%；形声字的数量其次，为150个，占35%；象形字的数量为73个，占17%；指事字仅为14个，占3%；假借字和转注字在本教材中没有出现，数量为零。

经部由于入选的文本数量最多，生字字数明显多于其他三部。由于四部中文本数量不一致，且文本主题、题材、年代、篇幅也不同，我们把四部中的生字字源比例进一步细分。

##### (1) 经部生字字源统计

经部中共有生字320个，在这些生字中，会意字数量最多，为143个，占经部生字总数的比重最大，为45%；形声字的数量次之，为107个，占33%；象形字56个，占18%；指事字有14个，占4%。

##### (2) 史部生字字源统计

史部中共有生字23个，其中会意字数量最多，有13个，占史部生字总数的57%；形声字和象形字的数量齐平，各有5个，各占22%；指事字的数量为零。

##### (3) 子部生字字源统计

子部中共有生字18个，其中会意字数量最多，有8个，占子部生字总数的44%；形声字数量次之，有7个，占39%；象形字有3个，占17%；指事字的数量为零。

##### (4) 集部生字字源统计

集部中共有生字67个，与前三部不同的是，其中形声字的数量最多，有32个，占集部生字总数的比重最大，为48%；会意字的数

量次之，有26个，占39%；象形字有9个，占13%；指事字的数量为零。

汪德迈认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类是纯造字，体现了中国表意文字的特性。后两类，转注和假借，是对已经存在的字进行使用，不能算入其中。前四种造字法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占卜官和史官有系统地通过字之间的互相组合，进行语素的再排列，而非简单地用现实里通过自发的语言次序而自然构成的口语词汇。

如何从字源来看待汉字与思辨的关联性？这或许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层面启迪我们的思考。汪德迈在其代表作《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一书中，将中国思想的思辨性与汉字甲骨文联系起来，具体剖析了汉字从占卜兆纹到表意文字的发展历程。此过程，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中国甲骨卜学高度精密化成果的表意文字，其创造就在这一演变的进程中，并反过来成为思辨的工具，占卜借此而变为以《易经》为其理论基础的宇宙而上。”<sup>①</sup>

在汪德迈的视野中，甲骨文阶段的汉字，从甲骨兆纹的卜相向“占卜方程式”的表意文字推进，在卜相之间的关联性中发展出思辨理性，这与西方以宗教神学为导向的思辨方式截然不同。汉语有两种功能，一是交流，二是思维。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专门服务于语言的思维功能。文言和口语虽然具有并行的一致性，但交流和思辨在汉语中是可以分开的，文言文不是口语书面化的结果，而是理性地提炼口语，形成新的语言，是中国表意文字的特征。汉字内部结构遵循着理性化的原则来组建，不需要被转化为表音文字。中国文言科学性和关联性的两大特点，也反映出中国思想具有关联理性的特征，这种思维逻辑受到占卜学的极大影响。<sup>②</sup>

从唐代到近代末期，由纯粹“文”的语言，经佛经翻译，产生白话书面语，形声字的分量加大。我们对《古文言读本》教材中的生字

① [法]汪德迈：《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和表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页。

② [法]汪德迈：《跨文化中国学（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第7—60页。

字源进行统计分析时，也注意到，法国汉学家对教本汉字的选择与汉字的造字发展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汪德迈和金丝燕对会意字、形声字的选择，也体现出自觉对形声字的接受和关注。

## 2. 词汇统计分析

古汉语以单音节词汇为主，而词汇因语境不同常出现一词多义和多词性的现象，因此，我们对教材中的词语进行语法分类时，只探讨该词语在文本语境中的用法和词性。

整部教材的词汇中，名词数量最多，为188个，占词汇总数量的44%；动词数量次之，为136个，占32%；形容词数量为55个，占13%；副词数量为15个，占4%；数量词数量为14个，占3%；代词数量为9个，占2%；连词数量为5个，占1%；介词和语气词数量是最少的，各为2个，由于太少，可忽略不计。

### （1）经部词汇数量统计

经部中共有318个词语，其中名词的数量最多，为153个，占经部词汇总数的48%；动词的数量次之，为99个，占31%；形容词数量为30个，占9%；数量词数量为14个，占4%；副词数量为11个，占3%；代词数量为5个，占2%；介词、连词、语气词数量最少，各有2个，各占1%。

### （2）史部词汇数量统计

史部中共有23个词语，其中形容词的数量最多，为8个，占史部词汇总数的35%；动词的数量次之，为7个，占30%；名词数量为5个，占22%；副词数量为2个，占9%；连词数量最少，有1个，占4%。史部中没有数量词、代词、介词和语气词。

### （3）子部词汇数量统计

子部中共有18个词语，其中动词的数量最多，为6个，占子部词汇总数的33%；形容词的数量次之，为5个，占28%；名词数量为3个，占17%；代词数量为2个，占11%；连词和副词数量最少，各有1个，各占6%。子部中没有数量词、介词和语气词。

#### (4) 集部词汇数量统计

集部中共有67个词语，其中名词的数量最多，为27个，占集部词汇总数的40%；动词的数量次之，为24个，占36%；形容词数量为12个，占18%；代词数量为2个，占3%；连词和副词数量最少，各有1个，各占1%。子部中没有数量词、介词和语气词。

教本中词汇的类型值得关注。与词形变化的语言不一样，中文是单音词语言，词义是语义的依据，这是语言预先理性化的前提。在交流中语义组成话语，理性化语义又产生感性经验。话语由词语切割而来，在表达中概念化，感性经验通过思辨形成概念抽象工作，语言不再是本能的，而具有了范畴性，依照理性原则运作，在西方思想中发展成逻辑学，在中国思想中发展成字法。

如汪德迈所言，中国的思辨精神来自对自然占卜方程的组合，而不是来自主观的话语，在组合的基础上发展成文言，作为记录，而不是单纯用于交流。代表性文字即青铜铭文，所记录的宗教祭祀礼仪制度，是思辨的。后世承袭礼制，文言的思辨性延伸到社会制度，中国思想中决定性的进展都是由卜人在记录语言时的思辨带来的。中国的哲学思辨在占卜学中成型，这种占卜学的遗传基因就一直存在于中国哲学思辨的领域中。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极为不同：西方思想从神学思辨起点发展，西方文化中的思辨性思想从记录话语的拼音文字中提取交流观点，再将交流语言理性化，提取概念化的主要内容。亚里士多德所概括的逻辑法则就是这样推算出来的。他将实体范畴概念化为类别，让事物的本性在话语中体现，所以，在表音语言中，思辨性思维不会产生语言，思辨只用于将交流性话语提炼成概念语言。思辨是话语逻辑。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也是这一观点的论证。而中国思想则是从占卜学思辨上出发，由此很早就产生了《易经》，《易经》如

西方传统的《圣经》，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中国思想史。<sup>①</sup>

### 3. 文本统计分析

《古文言读本》全教材包含二十二篇古文言文文本。编者汪德迈、金丝燕对课文文本的选择有无类型偏好？有无年代选择倾向？文本年代分类呈现出何种特征？对此，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文本四部分类数量统计。

在整部教材中，经部文本最多，共计17篇，占文本总数量的77%；集部的文本数量次之，有3篇，占14%；史部和子部的文本数量最少，各有1篇，各占4.5%。

#### (1) 经部属文本

教材经部文本多选自儒家“四书五经”中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五经的文本入选比例各不相同，其中选自“礼”的文本数量最多，有8篇，占经部文本总数的47%；选自“诗”和“书”的文本数量次之，各有3篇，各占18%；选自“易”的文本有2篇，占12%；选自“春秋”的文本数量最少，仅有1篇，占6%。

由此可以看出，编者对五经的文本各有兼顾，不仅保持了五经的全面性，而且对五经的文本有侧重，编者对“礼”的文本最为重视，重视礼仪教养，重视古文教化。

从典籍来看，《周易》选入2篇，《尚书》选入3篇，《礼记》选入7篇，《诗经》选入3篇，《仪礼》选入1篇，《春秋》选入1篇。《礼记》的入选篇数最多。因此，在经书的选择上，编者侧重在“礼”书中，而在“礼”的文本选择上，编者对《礼记》的文本选择要远远多于《仪礼》的文本选择。

#### (2) 史部属文本

史部只收录1篇古文言文文本，选自《史记·本纪·五帝本纪》。《史记》（汉·司马迁）是正史的一部分，《五帝本纪》是《史记》全书

<sup>①</sup> [法]汪德迈：《跨文化中国学（上）》，第22页。

一百三十篇中的第一篇。《古文言读本》课本选择《五帝本纪》中“黄帝”一节，介绍了黄帝的生平。

### (3) 子部属文本

子部只收录1篇古文言文本文，课本选择的是《道德经》中的第九篇。

### (4) 集部属文本

集部收录了3篇古文言文本文，分别是《文心雕龙》中的《原道》选段、《古诗十九首》中的第九首、《大本经》中的《长阿含》选段。

教材的编写程度本身受到时代、编者学识、知识准备等影响，对于文本的选取也是各有侧重。从文本类型上来看，汪德迈、金丝燕以经部文本为重点，这不意外，经部汇编儒家传统典籍，从西汉到清代，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种儒家文献渐次取得“经”的地位，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另外，从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始，儒学西传和国际“礼仪之争”的历程也让一代代欧洲汉学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十分熟悉。

虽然经部文本入选数量最多，但汪德迈和金丝燕在文本的选择上并不拘泥于儒家经典。教材文本的选择视野宽阔，不拘一格，题材体裁广泛，不仅有诸子散文、还有经典史学范本，更引入佛经文本，其例句来源真可谓兼具典范性、丰富性、代表性和多样性。

### 第二，文本年代统计。

我们对教材文本的年代进行了考证，《古文言读本》中22篇文本的成书年代各不相同，文本涉及7个年代，分别是：夏商时期、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西汉时期、东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教材中22篇文本年代不同，数量也不一致。其中，战国时期的文本数量最多，为9本，占全教材文本数量的41%；其次是西周时期的文本，为4本，占18%；春秋时期的文本数量和西汉时期的文本数量一样都是各2篇，分别占9%；东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本数量最少，

各1篇，分别占5%。

#### (1) 经部文本年代分布

经部由于文本数量大，文本年代比较丰富，其中战国时期的文本数最多，有7篇，分别是：《礼记·中庸》1篇、《礼记·曲礼》4篇、《礼记·礼运》1篇、《礼记·乐记》1篇。西周时期的文本数次之，有4本，分别是：《诗经·大雅·灵台》1篇、《仪礼·士冠礼》1篇、《诗经·小雅·鹿鸣》2篇。夏商时期的文本数有3本，分别是：《尚书·虞书·尧典》2篇、《尚书·虞书·大禹谟》1篇。春秋时期只有1本，选自《春秋左传》。

#### (2) 史部文本年代分布

史部文本数量为1本，选自《史记·本纪·五帝本纪》，文本成书年代是西汉时代。

#### (3) 子部文本年代分布

子部文本数量为1本，选自《道德经》第九章，文本成书年代是春秋时期。

#### (4) 集部文本年代分布

集部共3篇文本，分别选自西汉时期的《长阿含·大本经》、东汉时期的《古诗十九首》第九首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心雕龙·原道》篇。

从文本年代的跨度上来说，汪德迈、金丝燕更倾向于选择先秦时期的文本，儒家和诸子百家典籍是他们的选择重点，注重中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思想的丰富性。作为一本介绍性的古文言通识课本，文以载道，以文言来介绍中国的思想文化，这无疑《古文言读本》最大的特点。

在《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一书中，汪德迈认为中国文学的起源独一无二，来自占卜学的“文”，它是表意——表形文字，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非自然语言，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科学性。中国文字总是携带着中国文化特征。文字是深化认知，保存思辨性的

载体。没有文字，思辨思维只停留在话语层面，难以长久保存。汉字、汉语、文本、文化之间存在思辨的关系。中国的占卜学体现的是一种抽象卜兆的理性，对大自然的原始信仰由此得到脱离，进而被国家化。汪德迈所提出的中国语言形成过程中的“理性”和文字结构上的“逻辑性”，试图从文字字源的角度，对中国文言、文学进行探讨，进而解释中国文化何以儒家化、国家化而非宗教化的原因，由此得出一个重要概念，中国思想的相关性，它是宇宙而上的，不是形而上的。

正如汪德迈所强调的，中国的思辨性话语与西方语言相反，思辨的理性不来自与交流性话语，而是来自占卜所创造的认知性文言。中国的思辨是表意性逻辑。中国的文字，带有形旁和声旁，文字的结构组合本身包含意义，“文”的部件之间具有相关性，从而衍生出中国思辨思想，善于通过结构进行类比推理和演绎。表意文字的形旁将事物本性进行语义范畴化，中国思想的思辨性一大体现，在语义范畴化的基础上又深化到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宇宙范畴，五行由阴阳衍生出来，这是中国字法和西方逻辑的根本分歧。

文字的思辨性使得中国思想家用文学的方式将思想表述，无需再创造其他的哲学体裁。中国文人的“对联”也体现了这种文字的相关性和理性特点。清代纪昀有云：“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文以载道”是古代作家关于文学存在意义的最基本认识。文学的合理性取决于“道”的合理性，文学的发展必须有对“道”的承载。秉持着这一理念的古代文人，以他们笔底“载道”的诗文，书写着心志和情感，描绘着现实和人生。可以说，它不仅是一个理念，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自我修正机制的有机动力结构。它既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成果，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文学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内在动力源泉和生命力之所在。这在《古文言读本》的文本呈现上也有所体现。

#### 四、小结

人类语言因不同地域、不同族群而产生极大差异。正如《古文言读本》编者之一金丝燕所言，以表音文字为背景的法国，对中国文字的期待视野在自觉地接受会意字与不自觉地接受形声字之间游移。自觉地接受，指的是有意识地注重关注中国文字结构与表音文字的不同性质，即特殊的表意文字“文言”之会意或者形声中形旁的创字法，这是从传教士到今天法国汉学的倾向。接受形声字的不自觉性，指的是法国接受者出于自身语言表达习惯，自然而然地亲近汉字中的形声结构。<sup>①</sup>在这一地理层面上，中国表意文字是独一无二的，其独特性体现在“文”言和口语并行，具有一致性。

《古文言读本》教材以课为单位，从“文”入手，再解释文中的词语，帮助读者了解汉字字源构成和古汉语文本知识。这与汪德迈对中国汉字、文言、思想的研究保持一致。汪德迈认为中国文字具有重要性和特殊性：世界上一般的文字都是由口语产生的，文字是表述口语词汇的文字；而中国文字不都是从口语来的，中国文字的造字系统是被创造出来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文字息息相关：由占卜创造来而的表意文字包含着关联性思想，这种关联性思想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基本特征，即一种以事物结构的关联来解释事物的结构性思想，体现事物内部的平行性和相似性。因此，中国思想是结构性的，按形式逻辑运行，而非西方的因果性思想，关联性是占卜理性的烙印。关联理性延伸至文化的各个方面，又反过来体现在文字创造中，结构采用的是相关的逻辑（形式性逻辑 *moropho-logique*），而非西方造词法采用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因果逻辑 *etio-logique*）。例如，所有由“木”字旁构成的植物，因为思辨通过天然直觉看到都拥有“木头形”，这就是思辨性思

<sup>①</sup>〔法〕金丝燕：《文化转场：法国早期汉学视野》，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第63—68页。

维，以意言物的方式，就其对世界的初觉，根据形式—逻辑不断进行修正和细化。中国思想的特点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超越因果关系但涵盖因果关系的宇宙关联性。<sup>①</sup>

教材对文本的选择，反映出汪德迈对儒家经典和中国文言之间推动关系的重视。他指出，孔子对周王室的传统典册进行整理，其门人学徒决定编写老师授课的精彩内容，得以私用文言从事个人写作，故而在战国时期，相继出现诸子百家，各种以文言为文的私人写作大量涌现。汪德迈认为，这标志着文言的出现，文言以中国表意文字来书写，汉字在孔子之后才成为真正的一种语言媒介；同时也标志着，在中国，作家文学，即纯意义上的文学的问世。汪德迈进一步解释其原因，从文言的产生到文言的发展，也是从少量到多数汉字字汇的发展过程。

因此，汪德迈和金丝燕在教材编写中更重视“字”的独立性和“文”的整体性。编者不再执着于中法两种语言的对比，而是直接使用古汉语文本，先阅读文章，再解释文中的汉字。古汉语教学不再依附于法语的语法规则，而在于理解文中的汉字。语法讲解弱化了，重点放在介绍古文字字源上，通过对字源的介绍，让学习者了解汉字的发展历史，知晓汉字中蕴含的古老文化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所选的文章。“字”是独立的，“文”是整体的，用汉语的传统教学方式来重释古汉语，正如汪德迈在其《中国文化思想研究》一书中所强调的，不能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来套中国语言，西方语言学家应该向中国语言学家学习，他希望能开辟新路，用中国的材料来解释中国的思想。<sup>②</sup>

① [法]汪德迈：《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和表意》，第73—102页。

② [法]汪德迈：《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37—53页。